

辛亥粤军政府时期的钟荣光与朱执信

● 胡 耿

武昌起义胜利后，广东于1911年11月9日宣布独立后，迅速成立了广州军政府，由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出任军政府都督。他十分注意以同盟会会员为核心来组织与建设革命政权，坚持“非同党不用”。^[1]朱执信与钟荣光皆以“同党”身份加入到革命政权的建设中：朱执信任审计分处处长，钟荣光则任教育司司长。两人由于所受教育背景尤其是个性的不同，在共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

钟荣光出任教育司司长后，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以建立新式资产阶级教育为己任，设立省视学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视学制度始于晚清时期，视学之职责在于对地方学务进行监督指导。钟荣光在地方设立督学局后，拟设立省视学，以期能够更好更快地在全省推行资产阶级的新式教育。然而他的提案上报后，尽为省审计分处所驳回。审计分处系直隶于中央审计处，权力最大，凡是涉及到决算、预算的提案均需经过其审核后，方由财政司拨款。广东审计分处回驳设立省督学及华侨督学提案的理由是经费有限，认为这可向青年会申请募捐，政府无此能力担任。但此理由在钟荣光看来乃是审计分处处长朱执信挟公报私。

钟荣光有此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初时，就存在着复杂的派系斗争和权力倾轧。当时军政府有相当部分成员曾经留学欧美和日本，如实业司长关景桑、高等检查厅长黄兆圭、民政司长钱树芬、高等审判厅长伍

籍磐及钟荣光等都曾留学欧美，组成欧美派；而司法筹备处长陈融、都督府秘书杜贡石、金章、财政司长廖仲恺及审计分处长朱执信等曾留学日本，组成所谓日本派。钟荣光出任教育司系由各司向都督胡汉民荐任的。当时，独朱执信、胡毅生认为钟是基督教徒，不赞成其出任教育司长一职。但胡汉民认为钟荣光既是革命党人，又有丰富办学经验，还在游历国外时与国外资产阶级教育家有一定的交往，由他出任教育司长，推行资产阶级新教育是再合适不过了，乃循各司之请委任钟为司长。自此埋下钟朱两人嫌隙的种子。

钟荣光本人对朱执信的评价是：“倔强可爱”。他认为朱执信曾留日学政法，^[2]因此应该去当法官，出任审计分处处长，实“惜乎用非其才”。^[3]其实朱执信从小就很喜欢数学，很有经济才能，而且在这方面也很有天赋。这当然与其往日本留学，专门研究经济学有很大关系。正因为他在数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赴日本东京法政速成科留学后，他对经济学科非常重视。“东京速成科设政治、法律、经济等专门课程，朱执信对经济学科尤其重视，并不遗余力钻研数学。”^[4]他还曾经在广东法政学堂讲授过“中国财政史”、“应用经济学”这两门课程。^[5]胡汉民出任广东都督后，任命他为审计分处处长应该说是尽展其才，需知审计处涉及到财政支出的预算、决算，没有一定的经济、数学知识是难以担此重任。况且审计分处系重要部门，如果朱执信没有该方面的才能，相信胡汉民也断不敢将此要职交与其执掌。

据钟荣光本人忆述，他任教育司长后，常在都督府与朱执信、胡毅生相遇，彼此都缄默不语；如有公事交涉，朱、胡则对其“盛气相加”，“时时排钟”，“凡教育司所设施，无不驳斥，驳派省视学经费即是一例。”他还认为其对于设立省视学一事的驳斥理由是非常“无意识（即没有见识）”的，平时“但以意见行事，持一消极主义，无论需款多少，有时或并不须领公款，但不合彼意，则驳斥之”。^[6]对于此提案被驳回事，钟荣光并不死心，再次将提案送去，“几经驳诘，乃仅准派六人，列入本年预算”，而华侨视学则仍未获准派遣。

钟、朱两人之间在财政问题上的冲突并不止于视学一事。钟荣光设立督学局后大兴社会教育，需要经费，然审计分处“以款绌不发”，“一概驳回”。当钟荣光修缮教育司署办公地点时，“朱以其超出预算，力批驳之”。^[7]可见两人因财政问题的冲突不止一次。但朱执信认为省视学经费可由青年会募捐所得，却未必是明见。须知省视学经费向来属于省教育行政预算的一部分，由省府支出，如仅靠一个青年会募捐所得，如何能够保障经费的稳定与充足呢？朱执信对于视学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如此，时人对视学的意识由此也可可见一斑。

钟、朱之间的纠葛孰是孰非，我们无从得知。钟荣光对于朱的描述或许有主观的一面。朱执信是一位无神论者，既反对信佛，也反对信上帝。据胡汉民的回忆，朱执信在任职期间，对各机关每月的决算清册，都要亲自过问审核，严格审查，即使是对于自己的以前的学生、后来的上司——副都督陈炯明，也不徇私情：“某次，因稽核陈炯明军，不但于其军数查核至晰，即各队之军旗亦一一核之，分别指而诘陈曰：‘君各

队之军旗乃较簿籍所录之数为少，何耶？’陈为之气慑。”^[8]以朱、陈之间的交情，连一小小“军旗”他都不放过，足见其办事之秉公，决非是“意见行事”。事实上，朱执信手上所掌握之经费也的确不足。前清提学使司之教育经费，系由该司所管之产业自收自用，每年收入约150万两。辛亥革命后实行统一的财政政策，教育司虽接替提学使管理学务，然而教育经费却须由审计分处核准，报财政司领款。1913年广东的预算支出经费为4600万元，其中军费就约占39%，达到1800万余元，此外应还外债约为1000万；而全省的收入为2600万余元，财政赤字高达1900万元。该年的教育经费预算经财政司核准为885,300元（后追加省视学经费12,900元，共为898,200元），还不足全省财政支出的0.02%。此外，辛亥革命前之办学经费，多取自廊饷、花捐、赌捐等。辛亥革命后，各项杂捐多废止，地方税收又尚未划定，加上封建士绅趁机大量蚕食书田租税，仅靠其蚕食剩余之文社书院、书田税收办学，全省之教育经费自然较前清收入要少。民国肇建之初，经费紧张不独广东如此，全国皆然，各省行政机关之开销均是省至无可省，大多处于入不敷出。

细究钟朱两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私人恩怨。钟荣光本人对于经费紧张并非完全不知情，但他热心教育，一心盼望着广东教育能迅速发展，故而对于自己的筹划每每受阻，欲速而不达，不免气恼。而朱执信身为掌管粤省经济命脉的审计处长，自不能不思如何开源节流，解决“僧多粥少”的经费困境。钟朱均为广东的革命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人格、胸襟方面也历来为人们所称道，彼此间出现此种嫌隙，只能说是各自在其位则均尽心谋其职也。

孙中山父子与民初广州马路建设

●周丽丽 王 威

孙中山和孙科父子与广东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这里既是他们的故乡，更是其施展抱负的地方。孙中山曾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而孙科亦三次担任广州市市长。孙氏父子对于广东特别是广州的发展影响尤为重大，最突出的表现即为广州的市政建设。本文拟从市政建设中的马路建设进行探讨，揭示民国初年市政建设之艰难及孙氏父子对于广州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一

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观念最早由孙中

山引入国内，他早年游历过许多国家及城市，对于国外先进的市政建设印象很深，而在与国内落后的情形比较之后，对其触动很大。如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演说时即指出，“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印象。我每年返回故里香山二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安稳，香山反是。”^[1]因此在他主粤后对于广东的建设尤其是市政建设尤为注意。首先，提出将广东建设成为模范

省视学经费虽最终列入当年财政拨款范围，然而，款尚未到，就爆发了“二次革命”，粤省的省视学始终未能派出。

注释：

[1]屈大均《广东新语》，《屈大均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关于朱执信留学日本主修之专业，有不同的说法。关于朱执信在东京注重修习经济与数学科在很多论著中都有提及，但认为其主修经济的居多。认为他在日本主修政法的虽钟荣光外，尚有如下论述：“去日本后，他（朱执信）涉猎更广，除本学科外，还致力于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此外，他节衣缩食，从六百元学费中取一部分来购买中外数学家著作，以及天文、力学、进化论等自然科学书籍，以为自学之用。”（肖万源著：《朱执信思想研究》第3页记载）；“到了后来留学日本，研究法学哲学和练习日本语言文字”。（汪精卫《执信的人格》，选自《朱执信先生纪念专刊》，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宣传部出版，1929年9月21日，第14页。）认为他主修经济的有：“先生舍北京而往日本，专心研究经济科。”（朱秩如：《朱兄执信行状》，选自《朱执信先生纪念专刊》，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宣传部出版，1929年9月21日，第6页。）“朱先生以学问的宏博取得第一名，这时先生便

往日本留学，专研究经济学。”（程途编著：《朱执信》，正中书局印行，1938年6月，第15页。“到东京后，即入学梅谦次郎主持的政法速成科，因其性喜数学，故主修经济学，每有余钱即购泰西名家之数学书刊，尤喜演习难题”。

（吴湘吾著：《民国政治人物》第二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4月1日，第56页。）可见，无论朱执信在日本主修的是政法还是经济，有一点无可置疑的是他对于经济与数学还是很有研究的。

[3]钟荣光著：《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第44页。

[4]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10页。

[5]转见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第27页。

[6]钟荣光著：《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第51页。

[7]《陈白宣》：《朱执信先生秩事》，选自《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专刊》，中国国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出版，1933年9月21日，第16页。

[8]胡汉民：《朱执信别记》，《建国月刊》一卷六期，第58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